

1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 货币政策的运行背景

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并且十分成功的改革。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①但是由于中国国情及改革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是一个漫长而十分复杂的过程。这一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转型。这种经济的运转，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同于即将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有其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为了便于了解和掌握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运作特征，我们首先有必要把握货币政策的运行背景，因为任何货币政策制定或执行，并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从特定的经济

中国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在此之前，虽然有许多种提法，但并没有真正明确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金融背景出发 并适合于这种特定的经济金融背景 否则 就难以正确地制定或执行这些政策 并使之有效发挥作用。为了论述的方便 我把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的运行背景分为三个方面 即经济背景、体制背景和金融背景。当然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运作及特征。

1.1 货币政策运行的经济背景

1.1.1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1.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经济增长率一直居世界前列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形成了强烈对比。

中国与国外经济发展对比：

	中国	高收入国家	中上等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	除印度、中国外低收入国家
1980年—1992年人均GNP年均增长率	7.6	2.3	0.8	3.9	1.2
1980年—1992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	9.1	2.9	2.6	6.1	3.8

	美国	西德	日本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瑞典
1980年—1992年人均 GNP 年均增长率	1.7	2.4	3.6	2.4	1.7	1.8	1.6	1.5
1980年—1992年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	2.7	2.6	4.1	2.7	2.2	2.8	3.1	1.9

注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994 年发展报告》

与改革前比较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
1952年—1978年年均增长率		5.74%	
1978年—1992年年均增长率	10%	8.8%	

注资料来源：《中国的奇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工业化 国家	美国	欧共体	日本	其他工业 化国家	转型经 济国家	中国
1993年— 1996年 GDP 年均 增长率	2	2.5	1.6	1.25	2.47	-4.55	11.2

2. 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明显的降低，呈逐步稳定增长的状态

势。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 1958—1978 年的 20 年中 经济的增长呈大起大落之势。1958 年起三年大跃进中，工业生产净值增长了 1.2 倍 其中 1958 年的增长率高达 56.8% 而 1961 年、1962 年的调整时期，工业净产值则分别下降了 41.6% 和 15.4%。1960 年—1962 年间 国民收入呈负增长 其中 1961 年国民收入增长为负 29.2%。1967 年—1968 年 由于全国性的‘内乱’国民收入的增长又呈负数，1976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① 而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经济增长仍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增长最快的年份与最慢的年份差 10 个百分点，但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即使是增长最慢的年份，GNP 增长率也超过了 4%。^②

3. 经济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过去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倾向得到了纠正 轻工业及服务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得到了初步的矫正。改革开放前 由于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产业结构背离资源比较优势 造成轻工业及服务业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 资源配置逐步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部门倾斜，较好地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如 1952 年—1978 年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增长了 2779.5% 和 905.2% 前者为后者的 3 倍多 而 1978 年 - 1992 年间 分别增长了 371.2% 和 519.7% 前者不足后者的三分之二，^③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开始明显上升，产业结构出现高

① 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中国的奇绩》 中文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中国的奇绩》 中文大学出版社。

级化倾向。

4. 积累和消费比例趋于合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中，资源被最大限度的配置到资本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的生产受到极大抑制，影响了消费品供给的增长。同时国民收入的分配上 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居民收入增长缓慢，1952年—1978年间，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仅为 2.38% 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年平均仅增长 0.58%。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调整了产业结构，注意发挥比较经济优势。资源的相当部分配置转移到了消费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的供给迅速的增长。同时 在分配上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居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显然提高。1978年—1992年 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8.86%，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长 6.06%，扣除价格因素，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 8%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 5%。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 5.3% 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率为 4.9%。

1.1.2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培养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方面，既有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一些通病，也有自身经济矛盾的特殊性。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矛盾。存在短缺的非均衡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背景，资金短缺和结构失调是既有的制约经济发展

的客观因素加之在转轨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不规范都存在内在的扩张冲动即投资饥渴症。为谋求经济发展常依赖于投资规模的扩大。实现投资的财力直接或间接地都来自银行信贷而投资的数量超出了经济承受力没有相应的物力来保障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在出现通货膨胀尤其是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后为稳定经济运行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和实行紧缩政策为此经济发展又要付出相应代价。可以说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出现使得决策者在发展和稳定上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微观经济基础的构造及政府职能的转换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宏观调控难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控就死”的局面这一矛盾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未能较好地解决。

1979年后，我国即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苗头，但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农业发展很快为控制通货膨胀奠定了经济基础，通货膨胀的问题并不严重。1985年，1988年，1993年—1994年等年份又分别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它们有着三个共同的特点其一发生通货膨胀的前一年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正如有人所说“通货膨胀率明显滞后经济增长一年”。^①这反映人为刺激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带来严重通货膨胀。^②其二在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时经济增长速度陡然放慢如1980年，1986年，1989年—1991年，1995年这又反映通

厉以宁等主编：《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

厉以宁等：《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货膨胀确实对经济运行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其三，这三次通货膨胀均存在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如 1984 年底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银行在年终突击放款，1988 年推行价格改革闯关，1993 年金融秩序出现混乱。^① 这反映我国宏观调控在时机和着力点上把握不准。

经济发展增加了社会总供给，能较好地控制通货膨胀的发生；然而，通货膨胀的出现反映经济运行的秩序又出现混乱，不利于经济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关键在于确定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人为地刺激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当“经济增长达到社会资本存量约束下的生产能力后，……经济增长停滞甚至下降 但通货膨胀出现‘跳跃’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② 有人测算，我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为 9%—11%，经济增长保持在这一水平后，物价不会加速上升，超过这一速度会加速物价的上升，从长期看，不仅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降低经济增长。^③ 由此可知，人为地刺激经济增长最终会欲速则不达，韩国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现在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借鉴。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我国的通货膨胀一轮高过一轮 在控制和治理上难度将会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参见谢宏华等：《从金融波动到金融稳定》载《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4。

② 见厉以宁等：《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

左大培、杨帆：《西方过时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误用》载《经济研究参考》，1995（9）。

也越来越深 在宏观决策上 这应引起高度的警惕。下表是 1979 年—1996 年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的对比情况。

	GNP 增长率	零售物价增长率	GNP 折实指数
1979	7.6	2.00	4.02
1980	7.81	6.00	3.77
1981	4.48	2.40	2.14
1982	8.15	1.90	0.09
1983	10.32	1.50	1.37
1984	14.58	2.80	4.67
1985	12.73	8.80	9.81
1986	8.31	6.00	4.80
1987	11.01	7.30	5.10
1988	10.81	18.50	11.42
1989	3.90	17.80	9.17
1990	5.20	2.30	5.63
1991	7.00	3.00	3.47
1992	13.0	5.4	
1993	13.2	13.2	
1994	11.6	21.7	
1995	10.2	14.8	
1996	9.7	6.00	

2. 经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

展各地并不平衡。下表列出了 1980—1994 年各省区经济增长的情况。由于缺乏 1980 年各省的 GDP 数据，这里用各省区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国中的比重来近似代表各省区 GDP 在全国中的比重。考虑到海南建省，为便于 1980 年同 1994 年的比较，将 1994 年海南省数据纳入广东省。从表中第三栏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有 11 个省区的比重为增加，反映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它们依次是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广西、新疆、云南、河北、内蒙、青海、宁夏。有 16 个省区的比重减少，反映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它们依次是上海、辽宁、天津、黑龙江、北京、湖北、山西、吉林、湖南、甘肃、陕西、四川、江苏、河南、江西和安徽。西藏基本上没有变动，反映其发展速度与全国基本一致。由此可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原来的老工业基地。其中广东发展最快，其在全国的比重增加了 48.7 个百分点，上海发展最慢，下降了 43.4 个百分点。从 1990 年—1994 年的增长速度看，最快的前 7 个省区是海南、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广西和山东，最慢的 8 个省区是黑龙江、青海、宁夏、西藏、贵州、陕西、甘肃和内蒙古，反映经济活跃的地区日渐活跃，而西部地区将有可能更加落后，东西部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各地区自然资源赋存不同，历史发展基础和人文资源存在差异，各地区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各地区经济难以实现均衡发展的客观因素。

但是，各地区经济长期非均衡的发展所导致的贫富悬殊拉大毕竟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实现各地区均衡发展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这

就需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校正作用，目前有必要通过政策来引导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协作，同时在政策上要适当给予中西部一些优惠，以促进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

地 区	1980 年工农业 总产值在全国所 占比重 ‰	1994 年 GDP 在全 国所占比重 ‰	增减(排序) ‰	1990 年—1994 年 GDP 年均增 长和排序 ‰
北 京	31.4	23.3	-8.1(25)	11.2(15)
天 津	29.1	15.6	-13.5(27)	11.0(17)
河 北	44.3	46.9	+2.6	14.8(8)
山 西	23.0	18.3	-4.7(23)	9.8(19)
内 蒙 古	13.6	14.6	+1.0(9)	9.6(20)
辽 宁	71.4	52.8	-18.6(28)	11.0(17)
吉 林	25.5	20.9	-4.6(22)	11.2(15)
黑 龙 江	45.5	34.7	-10.8(26)	5.9(26)
上 海	85.7	42.3	-43.4(29)	12.7(11)
江 苏	90.0	87.1	-2.9(18)	18.8(5)
浙 江	44.2	57.2	+13(14)	19.7(4)
安 徽	32.8	31.9	-0.9(2)	14.0(9)
福 建	18.7	36.1	+17.4(16)	20.4(2)
江 西	22.4	20.3	-2.1(16)	13.6(10)
山 东	72.5	83.1	+10.6(4)	16.5(7)

地 区	1980 年工农业 总产值在全国所占比重	1994 年 GDP 在全 国所占比重	增减(排序)	1990 年—1994 年 GDP 年均增 长和排序
	%	%	%	%
河 南	49.1	47.7	-1.4(15)	12.5(12)
湖 北	48.0	40.3	-7.7(24)	12.5(12)
湖 南	41.0	36.3	-3.7(20)	11.1(16)
广 东	49.4	98.1	+48.7(1)	20.1(3)
广 西	20.6	26.6	+6.0(5)	17.0(6)
海 南				21.5(1)
四 川	62.3	59.6	-2.7(17)	11.4(14)
贵 州	11.3	11.2	-0.1(12)	8.9(22)
云 南	17.4	20.9	+3.5(7)	9.9(8)
西 藏	1.0	1.0	0.0(13)	8.0(23)
陕 西	20.7	17.5	-3.2(19)	9.5(21)
甘 肃	13.6	9.7	-3.9(21)	9.6(20)
青 海	2.7	3.0	+0.7(10)	7.5(25)
宁 夏	2.7	2.9	+0.2(11)	7.9(24)
新 疆	10.0	14.4	+4.4(6)	12.3(13)

注 第二栏中 海南省数据并入了广东省。

3. 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产业结构平衡是相对的、动态的。产业结构不平衡是不同产业之间数量比例关系和关联方式出现的失衡和冲突现象,它会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增长,产业结构

不平衡即意味着短缺的存在。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 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农业基础薄弱。1979 年—1994 年，我国农业年均增长 6.2%，粮食年均增长 2.4% 棉花年均增长 4.4%。对比轻工业的高速增长，我国农业增长速度较慢。1995 年全年农业增加值达到 11365 亿元 比 1994 年增长 4.5%，粮食比上年增长 4.5%，棉花比上年增长 3.7%。80 年代中期后，我国农业基本上呈现出徘徊的局面 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我国与其它国家不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出现问题 会引发相关轻工业以至国民经济一连串的经济问题 更重要的是 我国人口已超过 12 亿 农业不稳，会引发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至会波及全世界。虽然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小 但农业的波动会带动经济的波动 对总体经济有较强的间接影响。多年来 各地区展开的“粮食大战”、“棉花大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生产对经济的重要性 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几次通货膨胀，农业生产状况不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优先保证农业的稳定增长有着重要意义，在政策措施上，一方面须保证合理的农业投入，尤其是增加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投入；另一方面 在税费政策、信贷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农业服务体系完善等方面应适当鼓励农业发展。

第二 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突出地表现在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矛盾和能源生产、邮电交通与工业生产的矛盾两个方面。在 70 年代末 我国能源已趋紧张 改革开放以后 能源工业不仅没有超前发展 反而落后于工业的增长，“六·五”的年均电力生产弹性系数仅为 0.54，1986 年—1988 年仅为 0.59，能源工业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产业。能源的短缺导致生产能力闲置 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邮电交通是联系各项产业的纽带 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 长期出现大量待运货物积压、通信不方便 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邮电交通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瓶颈”。据测算,70年代和80年代 交通运输业净产值每增加1% 可使其余产业增长0.774%,80年代 交通运输业由于其“瓶颈”作用在国民收入增长率中的贡献达12.26%。然而 我国交通邮电业的发展长期未引起重视,1979年、1981年、1983年、1987年和1988年 交通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五次下降。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加工工业发展最快 家电、纺织等工业成倍、以至几十倍的增长 而原材料不时地出现短缺 钢铁、电力设备、化肥等材料尤为短缺 不得不依赖于进口。近年来,国家加重了对运输邮电业和能源工业的投资,1990、1992、1993、1994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工业和交通邮电业的总计投资分别占到40.9%、39.8%、37%、32.4%。铁路、高速公路、航空运输在近几年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有效地减轻了交通运输的压力,邮电业的飞速发展,使得我国通信的面貌焕然一新,1991年后,电力生产弹性系数已超过电力消费弹性系数,能源紧张的局面可能在今后几年内解决。

第三 服务业的发展呈畸形的态势。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最快,1978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3.7%,1994年则升至31.8%。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提高一般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递进。然而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是呈现出畸形的态势。表现在:①服务业的寄生性。许多从行政单位和工厂分离出来的公司并未为产业提供服务,而是一种变相的寻租部门,其出

现 导致产业的大量失血。1988 年前后出现的 打着为生产、流通服务旗号的各种‘官倒公司’、‘皮包公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②服务业的超前性。改革开放以后 各地便大兴楼堂馆所建设之风 屡禁不止 在公款消费的支撑下 我国服务业大大超前 脱离了国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已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 服务业的不规范性。房地产业、金融业的欺诈和投机现象较为严重 流通部门的暴利和宰客现象屡禁不止。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就业的解决和实现产业结构的递进有着重要作用，但若偏离了为产业和大众生活服务的轨道 则其发展无异于走向死胡同 也会造成对既有经济秩序的破坏。

第四，产业组织结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大型企业没有形成规模 比较分散 难以达到规模效益 加大了成本 很难形成相对优势。中小企业各地区存在小而全的现象 参差不齐 不仅没有发挥中小企业的优势 还形成了与大企业争资源争物资的情况 对总体经济的发展不利。另外 我国不同产业之间配合不佳 如冶金工业因技术不过关 产品质量差 就影响到下游产业如机械制造业的产品质量。

4. 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效率极为低下，经济增长的支撑主要依靠投入，依靠资源的消耗。1991 年 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中 物质消费高达 63.2% 其中工业占 72.1%。在创造同样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我国的能源消耗比美国高 3 倍 比日本高 7 倍。在大多数工业行业，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5% 左右。从单一行业来看，石油工业方面 原油加工耗电在 1985 年我国比日本高 13% 原油加工耗原油

比日本高 30%；同年的电力工业方面，线路损失率我国比日本高 41% 纺织工业方面 粘胶纤维耗电比日本高 131% 化工工业方面 电石耗焦炭比日本高 51%。工业产品中物耗、能耗居高不下，直接加大了工业产品的成本，这已成为一个很大的宏观经济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工业企业的效益低下 已构成经济运行的障碍 另外，工业产品质次价高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难以占据主动地位，竞争力大为下降。

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的贡献很小，据测算1978年—1989年期间，这一数据仅为 25%，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52%。而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40%以上。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实行这种以高积累、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数量上取得了成绩，在质量上并不理想。从实物形态看 我国资金极为短缺 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和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益应成为推行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过份依赖于耗资金、耗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将会难以为继，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

5. 投入产出不理想 经济效益下降。我国资金非常缺乏 却是一个高投资的国家，“六五”期间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7.6%，1990年增长 15.1%，1991年迅速增长 37.6%，1993年比上一年猛增 58.6%。投资数量巨大 但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 新增生产能力不高 投资效率因此也日趋下降。“六五”期间 固定投资每增加1% 国民收入增加到 0.78%，“七五”期间 国民收入增加到 1.33% 而到 1990年却降为 0.63%，1992年进一步降为 0.53%。 “六五”时期 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为 41元 到“七五”时期却

降为 37 元。每百元生产性积累在“六五”期间能增加国民收入 73 元，到“七五”时期却降为 58 元。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产值有递增的趋势，1978 年为 101.7 元，1993 年达到 115.8 元；但是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却呈递减趋势，1979 年为 24.9 元，1993 年为 12.9 元，差不多下降了一半。国有企业资金利税率和资金利润率也是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 年资金利税率为 24.2%，资金利润率为 24.9%，到 1993 年资金利税率已降到 9.7%，资金利润率已下降到 11.1%。依赖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日益下降，投入多，产出少，实际上已存在严重的浪费。据测算，在 80 年代，我国经济效益平均以 1.43% 的速度递减，这不能不令人忧虑。1990 年起，这种状况有所改善。

1.2 货币政策运行的体制背景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已经发生若干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1.2.1 计划体制改革的成就及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计划管理体制入手。在传统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完全是由国家计划统一规定，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没有活力，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僵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计划体制改革分为四个

阶段。首先是逐步地实行了国家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三种管理形式。其次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 扩大了地方、部门、企业的自主权。其三 制订产业发展计划 明确国民经济各领域中支持或限制的重点 调整产业结构 支持企业集团的发展 对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其四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 国家计划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的注重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搞好经济发展预测 总量调控 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 集中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 即由短期的微观的计划管理改变到中长期计划宏观计划上来，由原来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保证计划的实施，逐步地转移到利用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的轨道上来。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大幅度地缩小并改进指令性计划 指导性计划逐步成为主要的计划形式 并在广泛的领域和较大幅度内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作用。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 尽管计划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仍在诸多方面 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表现在：

1. 国家计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够。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不要计划的指导 问题是计划能否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 能否反映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其次 国家计划确定以后 能否有与之配套的 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手段与政策 以保证计划正确地发挥其指导作用。

2. 在下放计划权力的同时，仍未摆脱“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弊端。也就是说 在注重微观搞活下放权力的同时 没有注重培育市场主体 加之 各级政府职能不可能一下转换 真正